

蒙古史研究

參考資料

第 十 輯

1978年7月

内部参考 请勿转载

目 录

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史(选译)	〔苏〕Ф.А.库德里亚夫采夫(1)
布里亚特人	〔苏〕K.B.维亚特金娜(69)
布里亚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苏〕H.P.曼古托夫(120)
布里亚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摘译)	〔苏〕B.P.布扬图耶夫等(127)
布里亚特人	〔苏〕B.O.多勒吉赫(142)
布里亚特编年史	〔苏〕A.H.科佩洛夫(144)
布里亚特语	〔苏〕T.Γ.勃梁采娃(145)

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印

目 译 者 序

这本书是根据布里亚特蒙古国立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所员Ф.А. 库德里亚夫采夫所著的《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史》(1940年苏联科学研究院出版)翻译的。

关于作者库德里亚夫采夫的身分,非常遗憾,由于俄文文献无从获得没法加以说明。仅就我们的猜想: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蒙古学者,他像是专门研究西伯利亚史的,除本书之外,还著有:《十七世纪末东西伯利亚的农民、市民及哥萨克的起义》、《伊尔库次克市概观》、《西伯利亚劳动史》、《后贝加尔研究史》等书。

《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史》一书,费时十年始克完成。(本书第一卷只写了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前半叶时期。其后一直到1923年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成立为止的时期,作者目前正在执笔)。本书利用了布里亚特蒙古、伊尔库次克、赤塔、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图书馆所保存的无数文献资料。

本书中也利用了帕拉斯、米勒尔、十二月党人贝斯都捷夫兄弟、探险家、人种志学者、文学家克列缅茨、波塔宁、夏波夫、雅特琳采夫、夏希科夫等的著作,道尔济·班扎罗夫、咱巴罗夫、罕嘎洛夫、吉尔钦科等后贝加尔地方的研究家、及现代学者S.巴夫尔辛等的著作。

后者巴夫尔辛曾对本书有所批判,但据他说本书的优点是克服了去过所流传的、现代文献中所表现的若干谬误;谬误之一是布里亚特蒙古的特殊的狩猎时代,即所谓“泽格特=阿巴”时代的说法。据库德里亚夫采夫说。“泽格特=阿巴”并不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时代,而只是一种经济生活的构成要素。随着各时代,狩猎的比重的变化,因而布里亚特社会(发生了)阶级分化。又如(他)强调俄罗斯入侵布里亚特的两个方面:黑暗面和光明面。俄国农民的移民发展了该地的生产力进入了更高的经济生活方式。还强调了十二月党人在布里亚特的文化作用等方面

巴夫尔辛更指出本书的优点在于:无论旧文献或新的苏维埃文献都没有涉及

的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前半叶的（布里亚特的情况），有所论述。

迄今为止，日本所知道的布里亚特蒙古，都是从片断的介绍文章或小册子之类而来，所以翻译这本书，还不是完全无意义的。因此，列为《蒙古研究丛书》第三卷出版。

这本书是由两三个人分别翻译的，在译语方面难期严格的统一，更由于译者学识浅陋，错误在所难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又，本书译出时蒙东亚研究所小林宗三郎赐予指导，特此致谢。

蒙古研究所识 昭和十八年十一月

原 序

布里亚特民族和我国其他各民族一样是经历了困难而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系统地研究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史是苏维埃史学家的一项极其重要且紧迫的任务。这项（工作）是当局决定有关国民史的教授问题，是编纂庞大的苏联各民族历史的任务的一个不能分割的部分。履行这项任务没有研究我广阔无涯的祖国的多数民族历史的各个不同阶段的史学家的协作、集体的活动，是不可能的。《布里亚特蒙古史》概说，早在1929年即已着手（编写），在十年期间，一度停顿，搜集了新资料，联系到苏维埃史学的发展，又作了修改。本书是以新旧著作以及布里亚特蒙古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伊尔库次克、赤塔两州文书（科）保存的还没公开的资料为基础的，有些部分还利用了中央档案库的文件。概说第一卷包括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期间。第二卷应当包括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布里亚特蒙古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史。本书如对于研究与苏联各民族通史的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史有所裨益，作者就感到满足了。

Ф.А.库德里亚夫采夫识

布里亚特蒙古民族史（选译）

〔苏〕Ф.А.库德里亚夫采夫

全书目录（本刊选载其中第1—3章的一部分）

日译者序

原 序

第 一 章 十七世纪的布里亚特族

第 二 章 布里亚特被征服（1625—1689年）

第 三 章 十七世纪布里亚特人的起义

第 四 章 十七世纪后半叶及十八世纪对布里亚特的移民

第 五 章 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前半叶沿贝加尔地方的经济发展

第 六 章 十八世纪布里亚特人的经济

第 七 章 十八世纪布里亚特人的社会关系

第 八 章 十八世纪的西伯利亚行政和布里亚特人

第 九 章 十八世纪喇嘛教侵入布里亚特

第 十 章 十九世纪前半叶布里亚特人的社会、经济关系

第十一章 M.M.斯贝兰斯基视察西伯利亚与“草原统治”

第十二章 十九世纪二十五年代至五十年代沙皇制度的殖民政策

第十三章 十九世纪前半叶布里亚特国民教育史

第十四章 布里亚特的最早的学者——道尔济·班札罗夫（1822—1855年）

第一章 十七世纪的布里亚特族

分 布

表现在语言、领土、经济生活及文化上的共性，组成心理状态上的、历史的巩固的共同体的布里亚特民族是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所形成的，这个过程的初端没入遥远的往昔而无从察知。蒙古各系统种族加上鄂温克人和突厥人组成了布里亚特民族出现在沿贝加尔（湖）地区。布里亚特人传说：将作为布里亚特的基本种族的布拉嘎特人、额希里特人和豁里人人格化了的传说里的祖先布拉嘎特、额希里特和豁里诞生且成长的土地看作是自己自古以来的故乡。参加组成布里亚特人的还有居住在沿贝加尔湖的原住居民，以及其他后代移居该地区的人们。最后，在最近三个世纪期间与俄罗斯民族的接近，对布里亚特民族的成分也发生了影响。

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纪期间的历史文献记载说：占领“现在蒙古人所占国土的一端的色楞格河彼岸一带”^①是巴儿忽真脱窟木国。

在旅行家马可波罗（游记里）也报导了位于蒙古首都哈喇和林北方的古代巴尔虎。所谓巴儿忽真脱窟木国大约就在西部沿安加拉（河）地方与东部沿贝加尔（湖）地方一带吧！该国的居民中也只有居住在谦河（叶尼塞河）及安加拉木涟地方的种族的名称。巴儿忽真脱窟木的东部国境大约在色楞格河流域。

依照拉施德丁所证明的，居住在巴儿忽真脱窟木的有巴儿忽惕人（布尔特人）、豁里人以及与此相近的秃马惕人、不刺合臣人（狩猎人）、客列木臣人（猎栗鼠人）、槐因兀良合（住在林木中的乌梁海人）。以上各族都是“类似蒙古人”的林木中民族的称呼，拉施德丁在写林木中民族时曾写道：“蒙古人中象这样的种族很多”。他们和草原的、即畜牧种族不同，主要是从事狩猎和打鱼。狩猎野兽的人驯（养）了野生动物，其中包括专驯驮兽鹿和食乳肉鹿的。林木中民族也知道（使用）马，利用它来从事狩猎。这些种族中的一部分变成了游牧民=畜牧

人。例如，据《秘史》所传，豁里族之一的秃马惕（人）由于不满于禁止出入有黑貂和栗鼠的地方，（他们）以狩猎人的巧手所掘出来的小屋代替了叫做“住在斡耳朵天幕的人们”的游牧畜牧者的“有盖马车”，而开始了游牧。

从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期间，住在巴儿忽真脱窟木地方的林木中民族的种族的名称很象十七世纪及其以后的布里亚特种族的名称。拉施德丁和《元朝秘史》都记载了巴儿忽惕人、豁里人即豁里·秃马惕人（豁里人）、亦乞列思人（十七世纪的文献里与亦乞列思人并举的还有额希里特人）、不刺合臣人（布拉嘎特人）、等各种族。

东方学家 K.多桑和 D.班札罗夫曾提到过巴儿忽真脱窟木的居民，（他们）把“巴儿忽惕人”即“布尔特人”与“布里亚特人”的名称看作是一回事。^② 种族的一个名称，在发音时发生变化，而成为整个民族的后代名称的是常有的事。

十七世纪的俄罗斯防卫人员把贝加尔（湖）沿岸地方叫作“布拉特人（布里亚特人）的土地”，并把他们分为亦乞列思人、布尔古岱人和豁里人，即额希里特人、布拉嘎特人和豁里人。大约拉施德丁和《元朝秘史》中提出了名字的这些种族，就是贝加尔（湖）沿岸地方的原始居民。

“布里亚特人”这名称逐渐地不仅指称额希里特人或布拉嘎特人和豁里人，并且也包括了作为布里亚特居民的成员之一在这里札下根的一切人种集体。从十七世纪后半叶到十八世纪期间，乌松人、通古儿人、哈达卡人、塔崩古特人，萨尔多尔人，以及其他定居在色楞格地方的人们和定居在阿拉尔的布里亚特人、或东卡的布里亚特人中间的洪果多尔人等许多蒙古种族集团都从蒙古移居到贝加尔（湖）沿岸地方来了。起初，色楞格的蒙古移民还和布里亚特种族分别居住，叫作“蒙喀儿人”（蒙古人）。到十八世纪以后，他们为了区别于国外的蒙喀儿，便被称作“俄罗斯的蒙喀儿人”了。史学家米勒尔指出：色楞格人逐渐地加入了布里亚特人之中，“原来他们都是蒙喀儿人，归化俄罗斯才不过八十年。”俄罗斯蒙喀儿人流入后贝加尔的布里亚特人中间，结果成了布里亚特居民的地域区分的一部分（色楞格的布里亚特人）。

洪果多尔人比色楞格人还早些就在布里亚特种族中札下了根，洪果多尔人

(“刚果都儿族”)中各别的氏族名称早在1646年就以“亦乞列思”人和“博罗克”人(额希里特人和布拉嘎特人)的名称,出现在文献中了。

蒙古人种集体定居在贝加尔沿岸地方的过程到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缔结)后,便逐渐停止了。

进入十七世纪以后,布里亚特人的游牧便扩及贝加尔湖两岸的广大领域了。他们在安加拉、上勒拿、色楞格、鄂嫩以及锡尔加等河流域游牧。安加拉及其盆地主要是额希里特人居住。他们也有些人住在贝加尔(湖)中奥利洪岛上的。布拉嘎特人则住在安加拉及其支流的奥卡、温达、伊尔库特、翁迦、奇托依、贝拉雅、古打等河流域。据俄罗斯哥萨克提出的报告说:在后贝加尔地方,即色楞格、鄂嫩、英戈达、希洛克和石勒喀(等河)流域,布里亚特人和“蒙喀儿人结伴”游牧。这从一方面说:是布里亚特人——即通过库达拉草原去色楞格河口游牧的从贝加尔西面来的人,从另一方面说:是豁里入或某些蒙古种族。

布里亚特人游牧,西边大体上达到了叶尼塞河右岸的支流坎河,东边的界限是石勒喀河。

研究布里亚特人的土地的北方边境大体上是在叶尼塞的哥萨克们在奥卡河流入安加拉河的地方布拉特(布拉茨克)要塞地区内一带地域。这从1626年率领部下沿安加拉河到沙曼旱滩去的哥萨克头目马克西姆·贝尔菲利耶夫自鄂温克人(住在该地的舍玛吉尔族的通古斯人)听到说:到布里亚特国去还要三天的路程的说法,便可以知道了。1675年,俄罗斯驻中国大使尼古拉·斯帕法利记述了布拉特要塞,他是这样记述的,“奥卡河流经塞下,发源于草原,有农民及布拉特人住在该河流域。”

布里亚特人的分布状况,并不稠密,显示出明显的分散状况。他们专门从事畜牧,牧草丰富,因此,在适宜于畜牧经济的土地上定居着人数不多的集体。因为土地广阔,人口密度很低,因此,他们挑选恰好的牧场,逐次实行游牧。这样,他们便自成一个系统了。布里亚特人在他们所熟悉的地区内游牧。经常在这样的范围内,按照季节或该处牧草是否被牲畜吃光而变更牧场。只有遭到意外(有敌人袭击、或迫害,牧草不好、有冰度)的时候,才不得不长期抛弃其旧牧地区。熟

悉自己的“种族的土地”的布里亚特人，无论如何也是要返回他们的“老窝”去的。

众所周知，十七世纪后半叶，大多数逃脱了俄罗斯统治者迫害的布里亚特人都回到了他们自己的游牧地；例如其中之一就是象巴拉干斯克草原地方，因为住在哪里的布拉嘎特人大部分都逃走了，从1659年到1660年，这里差不多已经变成荒野了，不久以后，这里就又有人了，有趣的是他们发誓，只要招致布拉嘎特人逃亡的可恶的伊凡·波哈博夫统治在巴拉干斯克寨一消失，他们就回来。

逃到鄂尔浑的布里亚特人，1675年又回到了后贝加尔地方，他们向涅尔琴斯克寨的执政官提出了要求“交还贝加尔湖附近的原来就是他们的土地和奥利洪岛”的控诉。

布里亚特人清楚地知道哪些原来就是他们自己“氏族的土地”。他们拼命地证明哪些是他们自己所有的。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八世纪初，布里亚特各族以宰桑(出自华语的宰相——日译注)、收楞额(系收税官的意思——日译注)为首提出控诉要求发给他们自己的“氏族的土地”的“所有权证”；他们详细注明了作为游牧地限界的河川、森林、高地、引述了祖先历代在该地游牧的情形；以及那些“氏族的土地”状况。

认为游牧畜牧者完全不必附着土地可以任意变更自己的游牧地的思想方法是完全错误的。符拉基米尔佐夫曾说道：“欧洲的文献里曾随处可以看到、经常说：游牧人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到了他们所希望想要的东西的地方，他们便停下来，他们可以任意在他们自己的自由天地一草原上散步。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卢布鲁克曾正确地指出：蒙古人方面“任何一个首长都知道他们的适应自己部下人数的牧场的界限，都知道自己的牲畜群春、夏、秋、冬应该在哪里放牧”，^③

注：①《史集》，拉施德丁著，贝烈津译，载《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汇刊》第五卷、1885年，85页。

②班札罗夫：《关于卫拉特人与畏吾儿人》，《蒙古人的黑教或称萨满教》，彼得堡，1891年，82页。

③《多桑蒙古史》第一卷，从法文重译，伊尔库次克，1937年，35页。

④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列宁格勒，1934年，42—43页。

“所有权证”诉状所证明的是十七、八世纪布里亚特人清楚地辨明了自己的游牧区域。

经济生活状况

1627年前后，居住在接近布里亚特人的上安加拉的鄂温克人（通古斯人），为了征集雅萨克（指莫斯科、俄罗斯及帝俄时代向沿伏尔加、西伯利亚及俄领东亚氏族征课实物税=毛皮、家畜等一日译注）和检视布里亚特土地而率领哥萨克小队到他们那里来的哥萨克头目马克西姆·贝尔菲利耶夫曾提出过如下的报告。“土地丰饶居民也不少，人人都是生产者。布拉特人被告知要从小国来的大多数人征收贡物，布拉特人土地上的商品有黑貂、狐、海狸，还有丰富的布哈拉人的商品绢匹、印染更纱、曾德织品、绢绸、白布，而且有质地优良的银子，有无数的马、牛、羊、骆驼，可以种植大麦、荞麦等谷物。”^①

这个报告缺乏相当批判的评价，又没有和其他文书对比，不能囫圇吞枣那样使用它。鄂温克人是狩猎人、养鹿家、他们对以游牧的畜牧业为基础经济的布里亚特人，抱有夸大的观念。在彷徨于密林中获取猎物的狩猎人的眼里，把游牧畜牧业者看作是定居的“坐业者”。只有少数鹿的鄂温克人见到牛、羊、马群，就认为是“无数的”了。但是，马克西姆·贝尔菲利耶夫的“报告”只要去掉这类夸张之处，还是留下了有关十七世纪布里亚特人经济生活的基本因素的一些宝贵知识。

布里亚特人的主要经营是粗放的游牧畜牧业。十七世纪的文献，为了把布里亚特人和（养）“鹿的”鄂温克人相区别，（把他们）叫作“养家畜的人”和“养马的人们”。在1640年—1641年的《河川记》里记载着：“拉穆（贝加尔）湖上有个叫作奥利洪的岛屿，要过湖到岛上去，坐船需要一天的航程。那个岛上的居民多数是布拉特人。还有马和各种家畜。又，他们的粮食主要是黍。从奥利洪岛到拉穆湖对岸，也要坐一天的船。拉穆湖对岸也住着（养）马的布拉特人（养）鹿的通

古斯人……。拉穆湖是由十二条河的河口往里灌注色楞格河河水。色楞格河沿岸，从拉穆湖往右边看，右岸住着游牧的蒙喀尔人……。接着一个色楞格河口的有一条维德木水源。从维德木水源到石勒喀河去，通古斯人骑鹿要走五、六天。……又，石勒喀河注入大海，该河河岸（一带）的居民是（养）家畜的布拉特人。”^②

布里亚特人喂养马、牛、山羊、和骆驼。家畜中，只有骆驼，仅在后贝加尔地方与蒙古（人部落）相邻的部分才能见到。之所以把布里亚特人称作（养）“马的人们”，便可以证明他们养牛和小牲畜以及养马（事业）的发达。后代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格奥尔基在1772年就曾指出：豁里人养马是其经济的主要部门，他们彼此之间，简直成了爱情的对象了。^③西部布里亚特人养马比较的不发达，养牛、羊、山羊，也比较落后一步。

遗憾的是：仅就我们手头掌握的资料，还不可能把布里亚特人的畜牧经济记述完全。

畜牧业是布里亚特人社会生活的基本资源，是制作食物、衣料、鞋履、和建造帐篷的材料。就家畜来说，又是物品交易的主要对象。与畜牧业相比较其他经济部门，对布里亚特人来说，都成了次要的仅具有付业的意义了。

布里亚特人居住在森林草原地带。仅次于畜牧的是从事狩猎。狩猎的主要对象是黑貂、海狸、獭、狐貂、栗鼠、狼、獾、鹿、野山羊、麝香、猫及其他（动物）。其中黑貂、海狸、黑狐和银狐、貂、獭是物品交易中最贵重的毛皮兽。狩猎的主要工具是蒙古式的长弓和箭。其箭头是四面体或平板的，一般是铁制的。已知的布里亚特人的武器和战斗工具有铁枪、剑、长柄小刀、棍棒、斧、链帷子（甲冑）以及兜（锹形和垂直的兜）。例如：1695年防御布里亚特人来袭维尔霍连斯克寨的士兵的报告里就有如下的记述说：“布拉特人骑着备有马具的马穿戴着甲冑和兜来了，他们的战斗法是弓、枪和剑。”

武器和战斗工具上经常装饰着银的象眼。

一系列研究家都指出：布里亚特人中间是实行联合狩猎。一有称作泽格特·阿巴的。^④布里亚特人种志学家 M. 罕嘎洛夫说：“泽格特阿巴”这个术语是由“泽根”一獾和“阿巴”一出猎这两个词组成的。这个名称也适用于联合狩猎别的

猛兽。但也有人说“泽格特阿巴”是圆阵、锁形出猎的术语。人种志学者罕嘎洛夫和克列缅茨，都根据布里亚特与联合出猎的狩猎有关的传说、习惯仪式等记述了泽格特阿巴的时代。罕嘎洛夫曾考察过古代布里亚特人夏天捞鱼和采集供食用的草根、冬天从事狩猎的事。这些布里亚特人组成了大规模的兽皮加工合作社，同时，这也是军队。合作社的头头也就是领导战时和家庭生活的“长”（嘎尔沙）。最初他们是选拔出来的有组织能力的人，后来慢慢地他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的了。嘎尔沙一手独揽着世俗的和神权（萨满）的大权。泽格特阿巴时代的社会分成三个社会集团。即：

一、嘎尔沙、其亲属、个别的军事狩猎队领导人、铁匠。这是掌握统治权的传袭的贵族阶级。

二、组成中间的多数阶层的是世袭的狩猎人——这个集团中，还区别为有马者和无马者两部分。

三、最后是担当各种劳役的奴隶。

妇女和男子一样参加狩猎。泽格特 = 出猎人们的食品是野兽、鱼肉及植物的根块。他们住树皮造的小屋。毡制的帐篷或木小屋都还不会建造。

罕嘎洛夫把重点放在狩猎生活的时代定为泽格特阿巴时代。布里亚特人与俄罗斯人接触的最初阶段，便由大规模的狩猎合作社转变为小民族的联合体了，露出了想成为畜牧业者的意思了。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当俄国哥萨克部队出现的时期，布里亚特人已经完全成长为畜牧业者了。M.波格丹诺夫认为泽格特阿巴时代还应该更早些。他把远征生活中所遇到的社会关系体制描绘成泽格特阿巴传说里的社会关系。他这样写道：“这种情形，这种组织，导致人们认为是在古老的年代里所发生的、树立后代蒙古人在成吉思汗权力之下所完成的统一的军事游牧的君主政体的基因。”^⑤

总之，在布里亚特种族中已经普及了狩猎这一事实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描绘古代狩猎的图画，乱涂在沿贝加尔湖地方，有的雕刻在岩壁上，还涂上黑的、红的颜色。这些图画里有各种野兽，还有在野兽周围引弓、骑马、或步行的猎人。

简略地记述了十七世纪狩猎的人还有旅行家依斯布兰特·依德斯。他说：

“春秋两季，他们（布里亚特人）组织成不到一百人的团体，骑着马去打鹿、野山羊，野羊等。这种狩猎叫做“阿布拉沃”（ablavo）。他们把要打的野兽赶到一定的地方，把它们包围起来；然后（他们）分散在周围。他们带着自己的（弓）箭，走到可以射到野兽的范围内，对准生存的野兽射出一支一支的箭。每个射手所射的，不出三十支箭。狩猎完毕，猎人各自去拔取所射的箭（从射毙的野兽身上）。但是，在忙乱之际，也有射死马的，有时竟射死好几匹马。（他们）把野兽剥下皮，分开肉和骨头，然后在太阳底下晒。贮放好（肉）以后，他们又出猎了。”⑥

从事狩猎，几乎是整个民族都是这样。但是，泽格特阿巴并不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特殊时期而是经济生活的构成要素之一。由于各种历史发展时代的不同，狩猎（经济）的比重也随之发生变化。

狩猎肯定不是经济生活的基础。“象各种书籍所记载的，专门的狩猎民族，即仅只以狩猎为生的民族是没有的，因狩猎的猎获物是靠不住的”。与弓矢的发明同时，“野兽成了普通食物，狩猎成了一种正常的劳动部门。”

狩猎，不管是个人的，也不管是集体的，都是作为原始联合体经济的主要部门。就罕嘎洛夫所定的泽格特阿巴来说，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与原始共产制度的残余并存的，历史发展的，在很远的后代所固有的各种特征（上层统治阶层的分离、奴隶的存在）。这种泽格特阿巴同时带有军事演习、狩猎或娱乐的性质，使人联想到成吉思汗的大规模的出狩。与此类似的出狩遗制，在前世纪四十年代的阿嘎的布里亚特人那里还可以看到。那就是：“在民族的诗的习惯里，被保存了下来；在宗教的祭典里也有遗留。这些都是珍奇的，很有趣味的。那就是出猎，集体的出猎，特别是为了打草原上为数众多而且是温和的羊，或是凶猛的狼。这种出狩一般是有名（的人）而且富裕的大家族举办的。他们把应招而来的一百个甚至五百个自带小枪或弓箭的骑马的和徒步的猎人集合起来。一部分从森林中把野兽赶出来，赶到高声叫喊或敲打响器的猎人的圆阵中间。在旁边的其余骑马的猎人全速前进，盯住猎物，用小枪或箭射击。相互竞赛看谁更锐敏，更大胆。这是狩猎，同时也是娱乐。”⑦

由于供给可靠的生活资料的大量游牧畜产的发展, (这种) 联合狩猎便逐渐的稀少了。它的遗制在十七世纪, 甚至更后的年代, 也还保存着。但是, 联合出狩已经由有体系的 (制度) 逐渐变成了插曲似的行动了。再往下传, 直到近代, 一般都是作为祖先曾说过的留传下的神圣故事了。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就已经是以这样的形式出现了。 “好几千个熟练的联合狩猎参加者, 在附带的复杂的军事演习之后, 就红日高照之下, 所有群众的出猎情景就涌现出来了。”^⑨

除狩猎与打鱼之外, 每个布里亚特人集团都以农耕作为付业。在十七世纪, 还仅是处于萌芽的不安定状态。在历史、人种志学的文献中, 曾出现过: 在布里亚特人那里, 农业是很晚的时期才产生的意见。

十二月党人N.A. 贝斯都捷夫认为布里亚特人栽培谷物是在十九世纪最初十年间, 由于伊尔库次克知事托勒司琴的措施才开始的。但就是这个托勒司琴, 在1812年却写道: 伊尔库次克郡的布里亚特人 “很早以来就从事农业, 呈现出颇为兴盛的情况。但并非全部都是这样。”^⑩

据S.S. 夏希科夫的意见, 说: “住在伊尔库次克附近或其他俄罗斯著名的移居地的布里亚特人, 到十八世纪才转而从事农业。”在格奥尔基旅行的时候 (1772年) 布里亚特人就已经从事农业了”^⑪

E.V. 希恰古罗夫把豁里人看作是布里亚特人中间的农业开拓者。他在1796年, 指出: “豁里的布里亚特人在他们族人中间最先从事农业, 由于是他们开始的, 所以被选为自由经济团体的成员之一的最高 (级) 的太师 (住于诺颜之下, 语出元代中国话的太师一日译注)。以下是依达、克达、阿拉尔等布里亚特人, 从事农耕。”^⑫

最后别的研究家 (如M.N. 波格丹诺夫、E.N. 萨巴诺夫、A.N. 都尔诺夫、V. B. 吉尔钦科) 都认为布里亚特人的农业的发端, 还应该在更早的时期。V.B. 吉尔钦科就曾说过: “在现在, 布里亚特领地内的农业, 其起源相当古老, 一般是承认这一事实的。 (迄今) 还留下了有史以前的灌溉设施的遗迹。十七世纪出现在布里亚特人眼前的俄国人, 看见过农业。十八世纪的科学旅行家们已经报告过布里亚特人的农业的数字了。”

正象西布里亚特人的历史文件所证明的，一部分布里亚特人已经有了播种黍及荞麦的田地了。文件里记载了黍及克鲁累奇（荞麦）的田地。例如：1688年度，伊尔库次克公署曾命令率领一族人到阿拉尔草原来的一个叫巴哈库·依尔巴诺夫的人：“应该用够坚固的围墙把播种黍和刘草场围起来。”沿贝加尔地方发掘古坟的时候，也发现了黍和荞麦。在额希里特—布拉嘎特人的史话里，曾屡次出现史话的主人翁拿红的和黑的黍喂军马的事。

最普遍的谷物是黍。1641年，五十人长马丁·瓦西利耶夫曾叙述说：“许多不缴纳税的人是住在勒拿河和安加拉河之间的库达河岸边的。这库达河注入安加拉河，……又在这些布拉特人那里生产黍。”

同年，在这些哥萨克人的报告里可以看到下面这样的话：“翁迦河河口两岸住着布拉特人，他们的谷物是黍，我们在莫捷乌尔候爵那里看到过那黍。”^⑬

黍也是与鄂温克人做物物交换的对象之一。沿基连加河住的通古斯人多数也不向沙皇缴纳赋税，但是，拿黑貂与布拉特人交换家畜和黍。”^⑭

当谈到十七世纪布里亚特人的农业的时候，应该大书而特书的是在一部分布里亚特人中，与畜牧业相比，农业是不重要的，只充当付业的作用。但是，如果有了巩固的发达的农业的话，其后是必然会显著地发展起来的。经过一百年之后，和布里亚特人共同居住过的旅行家们（帕尔纳斯，格奥尔基）指出，他们的农业，在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其多少有些显著的发展，还是到了具备了刺激它发展的各种条件的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前半叶的时期。

十七世纪布里亚特经济除畜牧、狩猎、渔捞及幼稚的农业之外，其他部门中应该特别列举的，还有采掘铁矿、锻冶和采盐、制盐等。例如：众所周知，巴拉干斯克镇地区附近“到处是铁山，布拉嘎特人老早就巧妙地利用起来了。”^⑮据考古学资料说：从古代起，布里亚特蒙古境内有采铁和制作铁器的遗迹。在考古学资料里证实了十八世纪史学家E·费舍尔关于巴拉干斯克镇地区的铁山的报告。笔者于1924年曾在巴拉干斯克附近砂中，发现了古代炼铁所及锻冶场的遗迹、即发现了矿滓、铁块、铁制品碎片、铁制矢尻等。1934年，伊尔库次克博物馆及东西伯利亚研究会的考古学探险队一行去该地时也发现了昔日的熔矿炉。

与采矿时同，发展了锻冶事业，这样获得了很大的名声。具有锻冶才能的人们，在布里亚特人中间也和在其他一些民族中间一样，被认为是神的后代。照信奉萨满（僧）的人们说，只有西南和东北的腾格里才具有这种才能。奉前者之命锻冶厂的保勤托依把他们的子孙派到了大地上来，他们教给人们采掘金属和加工的方法。最初学习铁匠的人们把自己的手艺传给子孙。据信奉萨满教的人们说：就这样形成了锻冶家族。

与尊敬铁匠直接联系着，也尊重铁了。把厨师用的斧头放在病人或者睡着的人旁边，认为是可以保护这个人。总之，有这样的传说：布里亚特人的祖先苦心惨澹地采掘金属并加工制造，取得了锻冶业的成就。由于排除了多少巨大的困难所以才得到了特殊的尊敬。

布里亚特传说中的锻冶工，分为白的一银锻工（萌古儿达尔罕）和黑的冶匠（哈喇达尔罕）。前者制造有色金属器具、装饰品；被称作宝石工，后者是黑色金属（铁）的工匠。^⑩

铁匠制造狩猎用和军用的武器，斧子或庖丁调理食物及制盐用的锅类、马具的某些附属品、家庭用品等小物件。

布里亚特人那里也见到银器。即马具和武器的包饰和衣服的装饰品。

十七世纪的文件传说布里亚特人采盐（的事）。即：“在拉玛附近住着许多布里亚特人和通古斯人，布拉特人沿着安加拉河种黍，而通古斯卡河上游有盐泉，据称把盐（水）放在锅里煮。”^⑪

布里亚特人与鄂温克人及其他住在西伯利亚的种族（吐法拉尔人、科特人、阿琳人、贝利得尔人、卡马辛人），也与蒙古人、中国人进行物品交易。在布里亚特国里有布哈（拉）人的商品，即绢段、捺印染纱、及叫作缙缙的纺织品及叫作贝雅尔的纺织品等各种纺织品。

布里亚特人拿出毛皮用的野兽或毛皮去与猎人或养鹿人交换家畜、黍和铁制品。1631年，俄国的一些（哥萨克）兵在基连加河一带的“布拉特人们中间”遇到了鄂温克人。据鄂温克人说：他们是来“做生意”的，卖黑貂，买家畜。^⑫住在基连加河沿岸的“许多通古斯人”是“为了家畜和黍”而出卖黑貂的。

布里亚特人拿着毛皮用野兽到蒙古或中国去，那里，以“毛皮类”作交换，从中国买来银子或其他商品（如缎子、南京木绵、绢、某种金属制品等）。布里亚特封建社会的上层代表者们收买高价的纺织品、“银器和杯子”、金制品等装饰品。

“银子是从蒙喀尔来的，布拉特人拿黑貂从蒙喀尔人那里买来银子”这是从哥萨克们的报告里知道的。蒙古人也从中国人那里买来银子。他们在布里亚特人从（中国）买进中国商品时做中间人。“又这些蒙喀尔王和王子们都住在自己的采邑里，管理着领地，但是，他们这些蒙喀尔王及其属领的台沙，每年要派人去把各种珍品卖给博克多王。博克多王国什么物资都有，这个国王的领土内还出产银、银矿及其他许多东西。”^⑩哥萨克班长奥西布·瓦西利耶夫是这样报告的。

后贝加尔地方的布里亚特人，除了毛皮用的野兽以外，还把家畜卖给中国人，可是，布里亚特和中国通商是由封建社会的上层阶层掌握的。布里亚特的两个奴隶：谢灵喀和莫尔岱在1689年曾对哥萨克头目德米延·木诺哥古勒希奴依说：“到中国人的营地去，经常去探望宰桑、收楞额等贵人。他们的部落也经常有中国人来。他们什么家畜都买，有时也强夺。”^⑪

这样说，在叙述十七世纪布里亚特人的交易时，也不能夸大其规模与意义。作为交换对象的布里亚特经济作物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说，是带有自然（产物）的性质的。

对蒙古和中国市场来说，最有价值的商品是毛皮用野兽（主要是黑貂）。所以说，布里亚特贵族专门从以狩猎为业的一些小种族榨取赋税的野心，便是以此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十七世纪布里亚特的纳税人（贡纳民）是勒拿及安加拉（两河）的一部分鄂温克人、下乌达地区的吐法拉尔人（卡拉喀斯人）、阿怜人、贝尔德尔人、卡欣人、卡玛真人；住在坎斯克和米努辛斯克地区的科特人。

据说：1612年“通卡地方的居民遭到了布里亚特人的进攻，他们不得不把准备好向俄罗斯交纳的税品交给他们（布里亚特人）”。1690年，捷萨尔人向到托木斯克来的哥萨克报告说：“向他收税的是布里亚特人”吐法拉尔人们中间至今还残留着向布里亚特人纳税的传说。

1628年，住在坎河盆地的科特人向阿塔曼阿斯塔弗耶夫请求说：“他们受到了布里亚特人的种种压迫”非要报仇不可。因此，征收赋税是伴着迫害的，当然便诱致来自他们一边的反抗。布里亚特人与这些邻近的种族间以及各个布里亚特集团之间的冲突，结果当他们侵略的时候便利用“分裂、统治”的原则了。

布里亚特人与这些邻近部族人的和平联系是以经济生活关系为基础的。我们可以就他们相互间的交易关系谈一谈。据哥萨克兵的报告说：鄂温克人“和布里亚特人和平相处，而且共同饮食”。以家庭生活的联系为基础，产生了人种上的混杂。例如：有若干鄂温克人（巴吉索依佐、塔吉索依佐、咱雅库岱索依佐、鲁罗哥依、秦德兴）已经成了布里亚特的成员。

十七世纪布里亚特人的住家是移动游牧时易于搬迁的天幕。斯帕法利曾说：“涅尔琴斯克及色楞格的布拉特农民，作为纳税人，都带着他们的帐篷和大小家畜到色楞格河河上去游牧。”^②这是1687年，一个哥萨克兵的报告。斯帕法利也说：“巴拉干斯克县及安加拉河全流域的布拉特人的帐篷都是毡制的，服装是卡尔梅克式的，家畜有许多马、牛、羊等。”^③

木造小屋开始在西部的布里亚特人中间普及。十八世纪历史学家费舍尔的报告里说：“住在贝加尔湖北部地方的布里亚特人与其他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的习惯不同，住在一积木造的六边形的小屋里。但另一方面，为了拆迁方便，也不放弃过去他们所使用过的蒙古式的毡帐。”^④

以上，是十七世纪布里亚特人经济生活的主要要素。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发展了的社会关系，这将在下面叙述。

注①国立封建农奴制时代文书保管所（莫斯科），关于西伯利亚监理部的资料第十二栏，第87—89页（摘自贝尔菲利耶夫的报告）。

②《历史条令补遗》，第二卷，第八九号。

③E.格奥尔基，《全俄各民族志》，第二版，彼得堡，1799年。

④M.《罕嘎洛夫：阿巴—布里亚特人古代的野兽狩猎》，《俄罗斯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通报》，第十九卷，第三号，伊尔库次克，1882年。罕嘎洛夫、克列缅茨：《北布里亚特人的联合狩猎》，俄国人种志学博物馆—俄国人种法学资料，圣·彼得堡，1910年。